



张隆溪
作品系列

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张隆溪 著

同工异曲

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同工异曲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同工异曲

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张隆溪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工异曲: 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 张隆溪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8

(张隆溪作品系列)

ISBN 7-5343-7722-6

I. 同... II. 张...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
②比较文学—东方国家、西方国家 IV. ① G04 ②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024 号

- | | |
|---------|---|
| 出 版 者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 社 址 |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1088.com.cn |
| 出 版 人 | 张胜勇 |
| 书 名 | 同工异曲 |
| 作 者 | 张隆溪 |
| 责任编辑 | 浦渊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厂 址 |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
| 开 本 | 940mm × 640mm 1/16 |
| 印 张 | 7.25 |
| 字 数 | 79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3.00 元 |
| 发 行 热 线 | 010-62223842 |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隆溪，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西语系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等。



张隆溪作品系列

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

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增订版）

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与阐释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片语集



乐知博克
www.tikebook.com

策划编辑 / 季 进 席云舒
责任编辑 / 浦 渊
装帧设计 / 孟 娜

谨以此小书献给
亦师亦友的钱锺书先生（1910—1998）

总 序

在香港经李欧梵教授介绍，我结识了苏州大学的季进先生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先生。在他们两位的帮助策划之下，我决定把自己历年来写成的文字集中起来，交付江苏教育出版社出一套系列丛书。目前这个系列计划先出五种，计有《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20 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增订本）、《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与阐释》、《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和《片语集》。这几本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涉及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都是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较为广阔的视野里，来讨论文学和文化问题。我认为研究文学和文论，都不能局限在狭隘的定义和范围内，因为深入下去，文学就与整个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尤其和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领域有紧密联系。研究文学不能只在考论文字，而需在更广泛的文化范围内来讨论文学，这样对文学的理解也才会有一定深度。我希望今后这个系列可以扩大，把另外几本书也容纳在内，包括计划中的著作。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 1979 年长春出版的《文艺学研究论丛》上，题为“也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所谓“也谈”，是因为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社会科学战线》上，先有徐

朔方先生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文章。徐先生是学界前辈，又是研究汤显祖的权威，我当时不过是刚刚考入北大的研究生，可是却不知深浅，投稿给《社会科学战线》，要与徐先生商榷。我的文章并没有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了那本不大起眼的《文艺学研究论丛》上，不过那毕竟是自己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发表，我还是非常高兴，而此文讨论中西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我后来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在那之后不久，1980年冬季的《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 my 另一篇论文《弗莱的批评理论》，那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研究，仔细构想写成的文章，自己当时也颇为满意。这篇文章讨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是我后来一直注重研究的问题。回首一望，那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这二十多年来，我从北大到哈佛，从加州到香港，经历了不少变化，也到过不少地方，但与文字的因缘则始终如一，并且在中文之外，又用英文写了不少论文和几本专著。这次出一套系列丛书，就给了我一个整理自己文字和思想的绝好机会。

我从来都对人文学科有很浓厚的兴趣，所幸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的环境里，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虽然言不要其中，文不济于用，却自得其乐，而且从来都遵守一条自订的原则，就是作文态度必须认真，绝不随意敷衍，也绝不发表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文章。所以这许多年来，发表的文字并不算很多，又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许多文章用英文写成，所以很少有结集为中文的著作，就是这次系列中的五种，也有两种是友人翻译成中文的。在1983年至1984年，我曾在《读书》上连续发表评介西方文论的文章，1986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即《20世纪西方

文论述评》，那是我的第一本中文著作。差不多二十年后，到2000年才有另一本《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香港商务出版，2004年由三联出了增订新版。2005年年底，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算是我中文书的第三本。我自问生性还不算疏懒，虽有这样三本书，但我并不满意，还希望能给读者更多一点奉献，所以今后不敢懈怠，且更要努力。在这里写这些话，一方面是就这系列的书向读者稍作说明，但与此同时，也是提醒自己光阴荏苒，必须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多有一点成绩。

张隆溪

2006年3月25日

序

我们总爱过分强调我们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我们的仇恨，那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人类想要得救，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触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强化差异。

——博尔赫斯^①

这本小书的内容是我在2005年2月28日和3月1—3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做的四次“亚历山大演讲”，整理成书时只对原讲稿稍做了一些修改。除增加几个例子，在论证方面稍作扩充之外，我尽量保留讲稿原貌，希望读来仍然有口头说出来那种感觉。英文版原书将于2007年初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在加拿大出版，中文稿是按英文原稿重新写出的，使本书与英文版大致同步发行。

在内容方面，本书与“亚历山大演讲”系列丛书中以前诸种都有所不同，因为传统上“亚历山大演讲”乃注重西方文学，尤其是

^① Jorge Luis Borges, “Facing the Year 1983”, *Twenty-Four Conversations with Borges, Including a Selection of Poems*, trans. Nicomedes Suárez Araújo et al. Housatonic/Lascaux Publishers, 1984, p. 12.

英国文学。相比之下，本书讨论的文本则超出西方范围，在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背景上来展开讨论。不过这也就构成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因为一般人对东西方比较研究往往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觉得东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毫无可比之处，所以东西方比较根本就不能成立。在今日的学术环境里，知识的发展已分门别类到相当细微的程度，不同门类的知识领域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结果是学者们都不能不成为专治一门学问的专家，眼光盯住自己专业那一块狭小的地盘，不愿意放眼看出去。专家们往往眼里只有门前草地上那一两棵树，看不到大森林的宏大气魄和美，反而对森林抱着狐疑，投以不信任的眼光。然而除专家们对范围广阔的比较普遍表示怀疑之外，东西方比较研究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常常习惯于把东方、西方或东方人、西方人当成建构思想的概念积木块，粗糙笼统地累积起来思考，好像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概念，都是些根本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东西。强调文化差异非此即彼，不仅在思想上似乎对称而具吸引力（更不用说区分优劣高下而具吸引力），而且可以让人节省脑力，很容易针对一个异己的他者来确立自我，而不必费心去调查个案，去仔细审视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在观念、意象、主题和表现方式上的对应、交汇甚至重合之处。

习惯于用笼统粗糙的概念积木块来思考的人，一定觉得作这种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相当不舒服，因为这类调查必然会模糊各种定义的界限，使整个画面变得十分复杂。也许就因为如此，尤其在西方，仍然缺少有分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著作，而简单化、脸谱化的文化差异常常被充作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特征。此书之作，就正是

针对这样一种背景提出另一种意见，强调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在各方面的契合与类同，而不是专注于极端的区别或根本的差异。

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当然存在差异，可是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化范围之内。在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伦理政治方面的礼乐制度和行为规范，就迥异于道家主张无为与顺应自然，也不同于佛家信仰因果和来世，希求脱离人世众劫轮回之苦而达于涅槃至境。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唐诗虽然格律谨严，却直接抒发性情，自然天成，就不同于宋诗中一些大讲性理、空发议论之作；而杜甫之凝重沉郁，关心民间疾苦，也不同于李白之恣意豪放，驰骋想象而肯定自我。在西方也是一样，天主教的信仰不同于新教，法国戏剧家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主义也不同于莎士比亚之注重自然；或者借用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的话来说，“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所体验的中世纪，有别于拉斐尔前派所模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柏拉图主义不同于雪莱的柏拉图主义，荷尔德林（Hölderlin）笔下的俄狄浦斯（Oedipus）既非弗洛伊德的普遍个人，也不同于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所理解的那个瘸腿的巫师”^①。不仅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传统甚至同一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之间，确实也有各种差异。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象。

在差异之上，当然也还有令人惊讶的交汇与类同。然而这本小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东西方在观念和主题表现上的契合，而且还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9.

要提出一个更强的观点，即只有从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可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如果不超越单一文学传统有限的视野，我们就不可能有开阔的眼光，来纵览人类创造力的各种表现和无穷的可能性；而我们一旦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有了开阔的眼光，再回过头去反观许多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竟然没有留意到，也毫无批评的意识。我希望本书范围较广的举证，可以证实这一说法，而获取眼界开阔的批评见解，又可以证明本书所作的东西方比较研究自有其价值。

本书以我所做“亚历山大演讲”为基础，在修订成书时，我要感谢邀请我在 2005 年做此演讲的多伦多大学之大学学院院长保罗·佩龙（Paul Perron）教授以及多伦多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阿米卡利·雅努契（Amilcare Iannucci）教授。他们的邀请使我深感荣幸，也深觉谦卑，因为我完全了解，这是自 1928 年“亚历山大演讲”设立以来，第一次邀请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做此颇有声望的系列演讲。但我绝不认为自己是许许多多西方著名学者之后，作为东方的代表来做此演讲的。事实上，本书一个主要的论点正是要暴露集体式代表观念的谬误，那是一个相当常见的错误，即完全抹杀个人的种种差别，把具体的个人都归纳在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粗鄙的概念积木块之下。

由于本书是“亚历山大演讲”系列中第一次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讨论范围较广之各类文本，开篇第一章就要为这种广阔范围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所以便对文化不相通的观念，即对以东西方为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的观念提出批判。本书第一章通过论证这种不相通论的内在困难，指出在东西两方都有人提出这同样的论述，对这一

论述本身构成反讽，由此证明我们需要范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和鉴赏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后面三章就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个别主题和文本的具体细节，进一步展示跨文化理解的合理性和意义。第二章首先考察以手指月以及将人生比为旅途的比喻，然后讨论文学中珍珠的意象；第三章论述几篇中文作品中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毒药与良药的辩证关系；最后第四章探究圆圈和圆球的意象，考察在各种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本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周而复始、反反复归的循环运动概念。全书各章通过意象和观念互相关联，勾画出文本的碰撞和主题相似的轮廓，展示东西方文学和文化在概念构想和表现上的相似点，那种不期然的契合和同工异曲之妙。

我要感谢邀请我的主人和许多朋友，他们使我在多伦多度过十分愉快的一段时间。我特别要感谢约翰·塔克（John Tulk）博士和阿列克斯·吉辛（Alex Kisin）先生，感谢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友谊。我曾和几个朋友讨论过书中的一些想法，其中我要感谢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给我有益的评论，我尤其要对我的老朋友唐纳德·斯通（Donald Ston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他读过全书初稿，给我很多鼓励，并提出有益的意见。本书中有很多想法，都是受钱锺书先生著作典范的启迪，而我二十多年前有幸在北京与他相识，不时聆教，于我将是永远的鞭策和鼓励。我谨以此书纪念钱锺书先生，以此表示我对亦师亦友的钱先生的景仰和怀念，感谢他为后辈学子在寻求东西方跨文化理解的努力中，树立了最有感召力的典范。

张隆溪

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目 录

- 1 文化对立批判
- 23 “沧海月明珠有泪”：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 47 “这柔弱的一朵小花细皮娇嫩”：药与毒的变化之理
- 73 “反者道之动”：圆、循环与复归的辩证意义

文化对立批判

七十多年前，长期在印度服役、并担任吉卜林学会（Kipling Society）第一届会长的英国陆军少将莱昂利·查理·邓斯威尔（Lionel Charles Dunsterville），曾在伦敦吉卜林学会宣读一篇论文，并随后将此论文发表在1933年6月出版的《吉卜林学志》（*Kipling Journal*）上。邓斯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评论帝国诗人吉卜林（Kipling）对印度以及东方的看法，他自豪地将吉卜林引为同道，并对他的听众宣称说，吉卜林“是我们姑且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毫不动摇的代言人”^①。对于吉卜林和邓斯威尔来说，帝国主义并不是个令人难堪的字眼，而是代表了大英帝国的荣耀，使他们感到自豪。吉卜林曾有一著名诗句说：“啊，东即是东，西即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尽管吉卜林这首《东西方歌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受到英国，尤其是印度一些批评家的指责和抗议，他们

^① Lionel Charles Dunsterville, “‘Stalky’ on ‘Kipling’s India’ (1933)”, in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Roger Lancelyn Green, London: Routledge, 1997 (1971), p. 372.